

「主動右派」中的修正主義者

• 王思睿

一 「被動右派」與「主動右派」

1957年，有一百餘萬人被劃為右派份子或準右派份子。其中一部分人屬於「被動右派」，一部分人屬於「主動右派」。

「被動右派」指右派中的一部分人，他們是在1957年5月1日至6月7日的「整風運動」期間並無任何可以指摘的言行，卻被反右運動的各級領導者認定為右派的人。「被動右派」又可以分為兩個類型。一是大體上符合中共中央制訂的右派標準的人，這些人雖然沒有在「整風運動」中公開亮相，但過去或者私下裏可能說過一些不中聽的話，被領導、同事、同學，甚至配偶、子女揭發出來。另一個類型是根本不符合中共中央制訂的右派標準的人，僅僅因為本單位領導不喜歡或者為了湊右派人數比例而被圈定。

「主動右派」指右派中的另一部分人，他們是在「整風運動」期間確實有所言論、有所主張、有所行動，甚至有所組織的人；還包括在6月8日——「整風運動」已經轉變為「反右派鬥爭」——之後才「跳出來」的人，其中一些人是具有良知的中共黨員幹部，他們公開表態反對中共領導人的背信棄義，為救人而已溺。前者如北京大學「五一九運動」的關鍵人物陳奉孝，他坦承：「我是這次運動中的積極參加者和組織者，我發起創立了自由論壇……」^①。後者如中國科學院的黨員幹部許良英，看到「一個多月來天天以大量版面報導各地各界人士對共產黨的各種尖銳批評意見的《人民日報》，這一天完全變了臉，從社論到第8版，擺開了對那些批評意見進行全面反擊的凶狠架勢。……我怒不可遏，認為這會使黨失信於人民，……於是就以『捍衛毛主席路線』的忠誠黨員自居，公開反對反右派鬥爭」^②。

「主動右派」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右翼知識份子」、修正主義者、維權者。「右翼知識份子」要求調整政府構成和執政模式，修正主義者要求改變執政黨的

「主動右派」指右派中的一部分人，在「整風運動」期間確實有所言論、有所主張、有所行動，甚至有所組織的人。其政治主張和具體要求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不滿現狀，要求變革。

思想政治路線，維權者的着眼點則是維護人權（首先是人身權利，以及各項政治、經濟、社會權利），反對執政黨及其官員對於人權的肆意侵犯。儘管他們的政治主張和具體要求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不滿現狀，要求變革。限於篇幅，本文僅討論「主動右派」的一種類型——修正主義者，旨在揭示「主動右派」光譜中的一個歷史面向。

二 毛澤東心目中的修正主義者

毛澤東在1957年5月15日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把「右派」分為「社會上的右翼知識份子」和「修正主義者」。他寫道：「我黨有大批的知識份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也就是說，他心目中的「修正主義者」既有「括弧裏面的『共產黨人』，即共產黨的右派」，又有為數更多的青年團員的右派^③。事實上，「主動右派」中的修正主義者類型，還應該包括大多數非黨非團的大學生右派。到1957年，共產黨掌權已經八年，院系調整、「取締資產階級偽科學」已經五年，新一代大學生是「在紅旗下」接受教育和形成世界觀的，儘管他們「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百分之二十」^④，但他們與「右翼知識份子」已經失去了精神上的血脈關係。

毛澤東說：「他們（修正主義者）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份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⑤，這是不符合事實的。錢理群後來曾注意到：「值得注意的是，鳴放中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後來成了大右派的章伯鈞、羅隆基，以至儲安平等的言論，在大學校園內都沒有引起甚麼反應。」^⑥林希翎就很看不起上層的「右翼知識份子」。她說：「現在的『鳴、放』只是上層，這是不行的，我看上面的是老頭子，不大膽，世故深，不敢說，為了鞏固他現有的地位，不敢和共產黨鬧翻，要廣大群眾討論提出意見，再綜合起來，這是理想的。」^⑦修正主義者之所以不怕和共產黨鬧翻，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是一家人，家裏人吵架，不需要有顧忌。

反過來，「右翼知識份子」對於大學生右派在言行上的肆無忌憚，則是憂心忡忡。在著名的「六六六」會議^⑧上，費孝通說：現在各大學的學生都起來了，情緒激烈，事情很容易擴大。三百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就完了。曾昭掄說：他們上街，市民就結合起來，問題就鬧大了。這次整風可能黨的估計有錯誤，黨可能認為高級知識份子問題多，青年學生一定不會有甚麼問題，結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動。章伯鈞說：大學生這樣鬧下去，說不定會發生匈牙利那樣的事件。錢偉長說：現在的情況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黨派站出來說話就可以^⑨。葉篤義在四十多年後回憶，與會者「擬提議由民盟出面做學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勢穩定下來」，他們想約請周恩來共同探討如何平撫學生的情緒，「我一直守在電話機旁（等周的回音），等到半夜，最後知道這個建議遭到總理拒絕了」^⑩。

毛說修正主義者「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份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是不符合事實的。修正主義者之所以不怕和共產黨鬧翻，是因為他們自視為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是一家人，家裏人吵架，不需要有顧忌。

三 兩類修正主義者

本文所說的修正主義，是指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按照一般的政治思想分類，仍然屬於左翼的範疇，即比中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還要偏左一點。修正主義者主要包括兩類人——像林希翎、譚天榮這樣的「五一九」學生運動的骨幹份子，像李慎之、劉賓雁這樣的黨內知識份子右派。

我們現在知道，毛澤東在〈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批判的「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份子幹部」中包括李慎之。毛指控他們「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⑩但是，李慎之等人的言論在當時的報端上並沒有披露。劉賓雁等人從實踐中總結的理論新觀點，則是在給毛澤東本人的上書中流露的，一般群眾是不知道的。因此，當時「主動右派」中修正主義者的代表性觀點，是由林希翎、譚天榮這樣的大學生在「五一九運動」中公開發表的。

「主動右派」中修正主義者的代表性觀點，是由林希翎、譚天榮這樣的大學生在「五一九運動」中公開發表的。林希翎說，中國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她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中國不民主，要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

林希翎1935年生於上海，本名程海果，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3年以調幹生資格進入人大法律系讀書。林希翎是她第一次發表文藝評論時所用的筆名，來源於當時三位活躍的文藝評論家林默涵、李希凡和藍翎。從這個筆名，大體可看出林希翎當時的思想傾向。青年林希翎的思想背景有兩個來源：一是當時流行的教育思想（以毛澤東思想為主），二是當時的蘇聯文化。……由於特殊的經歷（林希翎曾和當時團中央書記胡耀邦的秘書談戀愛），她有機會讀到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這個報告改變了她的許多看法。謝泳寫道：「在1957年，一個20歲出頭的大學生能表現出這樣的思想鋒芒確實很不容易，因為她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成長的。對當時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而言，1957年的言論只是他們過去思想的自然發展而已，比之於40年代的言論，似乎並未提供甚麼更新的東西；但對於在封閉環境中成長的林希翎來說，她表現出的衝破單一思想模式的勇氣和能力，是學生右派中比較有代表性的。」^⑪林希翎在〈在北大的第一次發言〉一文說^⑫：

我有很多問題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鐵托演說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所有社會現象都有社會歷史根源，斯大林問題絕不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斯大林問題只會發生在蘇聯這種國家，因蘇聯過去是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也是一樣，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是的話，也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裏是不民主的，我管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到林希翎思想的主要來源與基本屬性。

「五一九」學生運動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譚天榮的思想狀況，與林希翎大致相同。他說：「社會主義這是我們自己的理想。完全不需要從外面輸入進來。可是現在這些現象，我們反對的那些東西，不是社會主義本身，而是對社會主義的歪曲。用哥穆爾卡的話來說，我們要反對的是那種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獄與欺騙的基礎之上的本國版的貝利亞主義。」^⑭又說：「『個人崇拜不能僅僅限於斯大林個人，個人崇拜曾經是流行於蘇聯的一種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經移植到所有的共產黨以及包括波蘭在內的一些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在波蘭事件以前，我們可以設想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袖可以這樣說嗎？然而在波蘭哥穆爾卡是真正的人民領袖，可以不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呢？在中國人民面前，有不有一次波蘭式的變革，我覺得這才是問題的關鍵」^⑮。

顯然，林希翎、譚天榮等學生右派的思想資源，不是來自孫中山、梁啟超、胡適、張君勱、梁漱溟，也不是來自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而是主要來自赫魯曉夫、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鐵托(Josip B. Tito)。毛澤東在1957年初就說過：「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他們隨着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⑯對於譚天榮來說，「五一九運動」是社會主義的「復歸」運動——「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復歸、教條主義向馬克思主義復歸、『三害』向民主復歸。」^⑰他在運動中倡議建立「黑格爾——恩格斯學派」，他說：「對於我，只有恩格斯才是絕對權威，……正是恩格斯教會了我怎樣生活、工作和戰鬥，……我便要把自己培養成恩格斯那樣柔韌，堅定而又深遠的人。」^⑱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古稀之年的譚天榮分析了「自己成為右派的三個原因：中學時期形成的『保爾情結』；未名湖畔北大人對我的潛移默化；以及自學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的心得體會」。他表示：「我至今仍然堅信馬克思主義。而且，我所堅信的馬克思主義，……是以剩餘價值學說和歷史唯物主義為中心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正是由於這種信念，我與我國改革開放以後的思潮格格不入」^⑲。

對於大學生中修正主義者的思想背景，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馬寅初看得很清楚。他說：「以前幾年學生都聽黨的指導和蘇聯專家的指導，學習馬列主義一系列的文件和書籍。有的學生是模糊的，有的學生是認真研究的。那些認真研究的學生，將馬克思的學說，以及唯物辯證法等等，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等等，研究出新的道理出來了，認為馬克思主義和一切學術已經過時，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完全錯誤，就開始不信了。」^⑳對馬列學術研究有素，對蘇聯社會主義革命認識清楚的學生，敢鳴敢放，批評黨領導教育部門的錯誤與黑暗。其他平素模糊的學生，亦恍然憬悟。」中國人民大學英語教授許孟雄說得更加一針見血：「共產黨所希望的人民大學，是要一窩蜂一般。那些學生經過黨的指導，馬列主義的教育成功以後……能飛往各地去螫人。」「但這群蜂在蜂窩裏看到不妥，變了質，不願螫人，反要咬製造蜂窩的主人。那是共產黨沒有想到的。」^㉑

由於列寧是反對修正主義的，所以在1957年並沒有甚麼人以修正主義者自我標榜，但當時修正主義的名聲還不像後來那麼壞。譚天榮說：修正主義是

對於大學生中修正主義者的思想背景，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馬寅初看得很清楚。他指出，對馬列學術研究有素，對蘇聯社會主義革命認識清楚的學生，敢於批評黨領導教育部門的錯誤與黑暗。

絕對不可避免的，普列漢諾夫 (Georgi V. Plekhanov) 和列寧也「修正」了馬克思主義^②。嚴仲強說：「現在修正主義這個用語的意義很不明確，它和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在某些方面有些混淆。」^③龍英華說：「現在是走誰的路，是斯大林路線和南斯拉夫路線誰勝利的問題。鐵托、陶里亞蒂、毛澤東、赫魯曉夫是現階段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④。作為斯大林教條主義的對立面，他把毛澤東與國際上的著名修正主義者並列在一起。毛澤東本人無疑是一個勇於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修正主義者。小修正主義者譚天榮曾天真地說：「(我)不懷疑毛主席也永遠支持我們」^⑤。然而，小修正主義者們所不理解的是，基於帝王心態，毛認為老子怎麼「修正」都可以，「娃娃」們要「修正」，就是右派，就要專政。

四 修正主義者的主要觀點

1957年「娃娃」們主要的修正主義觀點，就是鼓吹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和人權。北京大學一篇佚名大字報稱：「這次民主運動，主要的是一次群眾在擁護社會主義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爭取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運動，是青年人掙脫一切束縛，爭取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是東方文藝復興的序幕。『五·一九』的重大意義，將為歷史所證明。」^⑥葉於注寫道，一切社會都有民主；民主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其本性說，要求它的上層建築具有高度的民主性；社會主義民主是最高類型的民主；必須擴大社會主義民主，首先建立起一個民主自由的輿論來。^⑦龍英華提出：「我們有了一個社會主義工業化，還應有個社會主義民主化(也訂出五年計劃來)。『民主長一分，生產長一寸』！現在農村民主化，實行選舉。工廠學校應向農村學習。」^⑧王國鄉說：「社會主義的靈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沒有這社會主義就會枯萎，……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爭取民主，保障人權和精神人格的獨立這就是我們鬥爭的目的。」^⑨譚天榮一篇文章末尾的口號是：「自由、民主、理性、人權萬歲！」^⑩經過反右運動的殘酷打壓，同樣的口號，要等到1970年代才由李一哲和任曉町等人再次公開提倡。

「右翼知識份子」談民主，談法治，談立法，談監督，但很少談特權階級(階層)，這是他們與修正主義者的一個重要差異。可以說，特權階級論(或新階級論)是「娃娃」們的修正主義的理論核心，而這一觀點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基礎之上。龍英華說：「在社會主義中，說有新階級，即是修正主義。但是有階層，揭出這一點是有好處的。」^⑪譚天榮說：「在周大覺看來，現在人民內部矛盾主要是領導者與群眾的矛盾，具有階級矛盾的性質，我覺得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運用的一次嘗試」^⑫。特權階級論(或新階級論)，萌芽於盧森堡(Rosa Luxemburg)，成形於吉拉斯(Milovan Djilas，又譯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一書^⑬。吉拉斯的書1957年在美國出版，中譯本於1963年內部發行，「五一九運動」的參與者可能聽說過他的觀點，卻不大

「右翼知識份子」談民主，談法治，談立法，談監督，但很少談特權階級(階層)，這是他們與修正主義者的一個重要差異。可以說，特權階級論(或新階級論)是「娃娃」們的修正主義的理論核心，而這一觀點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基礎之上。

可能看過他的著作，但是，中國大學生們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得出了與吉拉斯大致相同的觀點。

周大覺以「一個自幼耕讀，掙扎，受地主，也受新階級壓迫者」的名義寫道：「隨着舊階級的消滅，新的階級又起來了」，「社會地位，憲法上名義上規定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種待遇（不論工作、學習、遊玩、吃飯……）均論等級，顯易可見不平等，一個小小的黨支部書記可以呵斥直到無辜的鬥爭，施以肉刑（變相的），這和封建統治者對農民的態度有何區別？」「官官相附（例如魏巍所揭露的）可見已開始自覺地形成一個社會集團，他們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等特殊的利益。」他呼籲「反對特權階級的存在」，「反對新的變相的階級壓迫」^③。群學說：「問題之所在，是公有制如何使其名符其實——就是體現在分配上的合理化（決非絕對平等）。現在，經濟上以各種名目，照顧之類，較高級官員過多地實際地佔有社會勞動產品，此外政治地位，人格等等的實際上極不平等，這些現象決非一個國家、一地，半載一年存在，而是全面，長期存在。這就是『談論』所說的『新階級』的形成，它的枝葉是在不完備的公有制的空隙上滋長起來的。決不能簡單地、唯心地『說成是』人們的思想問題。由於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的懸殊，就必然地要產生個人崇拜」^④。岑超南說：「領導由於官僚主義不接近群眾，不相信群眾，可是領導要工作就要有耳目，由於宗派主義，於是就找黨團員這些上層份子為耳目，特殊階層隨而產生！」「領導深入群眾，信任群眾，與群眾商量工作自然會好，不必特殊階層代勞了！」他的大字報的結束語是：「特殊階層，歷史使命已告終了，安息吧！」^⑤

佚名的大字報說得更加尖銳：「當權者們利用革命勝利後人民對黨的無限的熱愛與信任（甚至到盲從的程度）偷偷的將自己和勞動人民隔開了，當權者們利用了人民對黨的迷信加上自己的權力給自己立下了各種各樣的特權（無數鐵的事實都說明了這一點，請參看『談談』同學與『談論』同學的文章），這些特權絕不是經濟上的報酬，還有政治、社會地位和各種制度的保證形成了一個當權集團的整體，而且這個整體是愈來愈穩定了，誰做上官，那麼他將永遠的做官（除非犯了反革命的罪），而且他們孩子也做官，大官的兒子是不會做堂倌和理髮員的，有頭腦的人們！這種穩定性有世襲制度的氣味。」^⑥「現實生活中當權集團在生產資料支配上具有『超群』的特權，這種特權與他們在政治上，社會地位上的其他特權組成了一個整體，這個當權集團與勞動群眾便是現在社會主義內部的主要對立面，目前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重大錯誤都可以在這裏找到根源。這樣一個嚴重脫離群眾的當權集團與其追隨者的存在，就是『三害』得以橫行一時的基礎……它們嚴重地阻礙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目前社會主義內部主要對立面（脫離群眾的當權集團與勞動群眾）的鬥爭與統一就是社會主義進一步的發展。而且發展是遵從着漸變到突變的規律，因此，當人民發覺到生產關係中嚴重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一面時，就必然要求一個根本變革。」^⑦對於修正主義類型的學生右派來說，理想模式還是要「復歸」到老祖宗馬克思那裏，這就是巴黎公社式的制度，或者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⑧。

修正主義類型的學生右派，反對特權階級的存在，反對新的變相的階級壓迫。對他們來說，理想模式還是要「復歸」到老祖宗馬克思那裏。這就是巴黎公社式的制度，或者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

五 「五一九」民主運動

郭羅基指出了學生運動中的修正主義者與民主黨派中的「右翼知識份子」的「不同」，「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思想性、理論性十分突出……二是企圖將『大鳴大放』擴展為一場民主運動」^⑳。前者是言論層面上的差異，後者是行為方式上的區別。

「五一九運動」（這裏泛指北京大學和北京各高校乃至波及全國的學生運動）的「第一聲」，是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學「歷史系一群團員和青年」（其實只是歷史系學生許南亭自己一個人）在大飯廳貼出的大字告示（後來被命名為「大字報」），全文為：「青年團全國第三次代表大會，清華有代表，北大有沒有？如果有，是誰？是誰選的？他能不能代表我們的意見？」隨後，哲學系學生龍英華貼出一張16開紙的小字告示，其內容是：「要求開闢民主牆 一、要求取消黨委制 二、要求取消政治課必修制度 三、開闢民主園地，讓同學給黨提意見，幫助整風」。數學系四名學生（張景中、楊路、陳奉孝、錢如平）組成的「自由論壇」則提出了四項主張，包括：「一、取消黨委制，實行民主辦校；二、取消政治課必修制；三、取消留學生內定制，實行平等競爭的選拔制；四、開闢自由論壇，確保言論、集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㉑接下來，是中文系學生沈澤宜、張元勳的詩《是時候了》，抄寫在兩張粉紅色標語紙上。詩中寫道：「是時候了，／年輕人／放開嗓子唱！」「歌唱真理的弟兄們／快將火炬舉起」，「燒毀一切／人世的藩籬」，「為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㉒20日，譚天榮貼出大字報《第一株毒草》，以後又陸續貼出第二、三、四株「毒草」。「據當時不斷貼出的署名『無名氏』所寫的大字報《新聞公報》的『統計數字』：『從5月19日下午到20日下午5時20分止，校園內的大字報共162張。』其實，『無名氏』的統計僅是一日之狀，而後的情勢則已成『等比級數』上升。」^㉓大字報這種表達方式，也迅速地從北京大學傳播到中國人民大學等其他高校。

校園中另一種重要的表達方式是討論會、演講會、辯論會。根據魯丹的回憶，早在5月上旬，「大學生們的心已經從書本，吸引到關心整風運動上。（中國人民大學）校院裏開始貼出各種布告：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探討會，歡迎參加。中國農業問題研究會，歡迎發言。」到「五一九運動」之後，討論會的話題逐步升級。「新聞系宿舍前出現了一張《論黨有沒有危機》的座談會廣告，約請有興趣的同學座談討論」^㉔。在北京大學，到5月20日晚上，「同學們已不滿足於寫大字報，還在廣場上開展了辯論會，很簡陋，卻也很方便，搬來一張桌子，就是講壇，誰想說甚麼就上去發表一通意見，如果想說話的人多，就排隊，而且還限制時間，熱烈而民主。一時之間，北大校園熱氣騰騰。大家都感到很興奮。」^㉕23日下午，由校方準備好大型講台（「上鋪木板，置長桌、長椅，周設鐵架，懸聚光燈、擴音器，裝備甚好」）的辯論會在「三角地」舉行，「五一九運動」的主角之一林希翎，就是在此次辯論會上呼籲為胡風平反而嶄露頭角。當晚，大餐廳外牆上有人貼出大字標語：「林希翎萬歲！」^㉖

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學的辯論會上登台亮相，標誌着校際串聯的開場。5月26日，北京市高等學校運動會在清華大學舉行，以西語系英語專

「五一九運動」後，以大字報作為表達意見方式愈來愈多，迅速地從北京大學傳播到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另一種重要的表達方式是討論會、演講會、辯論會。

業三年級全體同學為主體的北京大學二十九名師生(包括一名教師黃繼忠)，前往清華大學，擬將北大的運動情況向與會各校作一宣講。此後，譚天榮、譚金水、李燕生、王國鄉和陳奉孝等人又「分頭到清華、人大、北師大、北京石油學院、北京航空學院等大學去與這些大學的學生進行了聯繫」^④。6月2日至5日，北大六人小組(譚天榮、劉奇弟、張景中、楊路、沈澤宜、梁次平)前往天津的南開大學等幾個高校串聯，介紹情況，發表演說，「開展『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此外，北大學生為了擴大影響，還把油印刊物《接力棒》寄往全國各高校^⑤。

北京大學的運動骨幹們還進行了「組織化」的嘗試。5月28日晚，由陳奉孝發起，他和張景中、楊路、譚天榮、龍英華、王國鄉等人在未名湖畔花神廟開了「預備會議」，商議按憲法賦予的權利，成立一個組織，譚天榮提議起名「黑格爾——恩格斯學派」。第二天晚上，在外文樓一樓西端的階梯大教室裏召開了「成立大會」，根據張景中的建議，組織名稱改為「百花學社」。30日晚，學社骨幹譚天榮、張元勳、沈澤宜、崔德甫、王國鄉、龍英華、葉於泮、袁櫓林、張景中、楊路、譚金水、趙清、李燕生等人在陳奉孝的宿舍開會，推選譚天榮為社長，陳奉孝為秘書長兼管組織股、總務股，張景中為宣傳股負責人。會議決定辦一個刊物，張元勳建議命名為《廣場》，以體現五四時代北大的「民主廣場」這個歷史意義。《廣場》主編張元勳，副主編沈澤宜、王國鄉、崔德甫，編委為：譚天榮、陳奉孝、張景中、楊路、趙清、袁櫓林、葉於泮、梁次平、李燕生、張志華、李亞白、龍英華、譚金水等人。31日，正式發表了《百花學社成立宣言》，表示要發揚五四精神，把「五一九」民主運動進行到底^⑥。

北京大學的「運動開始之後，除了大小字報，同學們還編寫和油印『出版』各種小報，最初就有前面提到的《新聞公報》，以後又出了《自由論壇》和《百花壇》，此外，還有《浪淘沙》等等刊物。……據說，到了二十幾號，就有刊物八種之多。」^④《廣場》編委會決定把刊物鉛印一萬冊，在校內外廣泛分發。6月5日，張元勳與崔德甫將買來的白紙三十令與稿件及封面圖案鉛版等送至北京市印刷一廠，約定五天後(即6月10日)校閱清樣。到了10日，《人民日報》已經發布了反右派的檄文，印刷廠奉命撕毀合同，並扣押了稿件和紙張。面對政府的高壓手段，《廣場》編委會沒有屈服，他們決定自己動手，油印《廣場》。從18日至20日，他們刻版三套，總共二百多頁蠟紙，「6月21日下午，我們一齊動手油印、摺頁、裝訂」，「至次日凌晨共成五百餘冊，為策略計，未用『廣場』作刊名，只以《北大民主牆選輯》名之」。隨即「在大餐廳東門外的空地上放一張小桌」，「人們便馬上圍攏了來，搶購如潮」，刊物「頃刻售盡」^⑤。

王書瑤說：「從1957年開始，中國的重大政治運動，就一直同大字報結下了不解之緣，其源蓋出於北大之第一張大字報，北大這第一次大字報運動。」^⑥不僅僅是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民間社團、民辦報刊，此後歷次學生運動的多種活動樣式，都是對「五一九運動」的繼承和發揚。胡耀邦曾一度指責青年學生在歷史上三次向中共奪權，第一次是指1957年的「五一九運動」，第二次是指1966年的紅衛兵運動，第三次是指1980年冬季的高校競選運動^⑦。其實，受毛澤東、康生等人操縱的紅衛兵運動與完全自發的另外兩次學生運動不可同日而

北京大學的運動骨幹們在未名湖畔花神廟開了「預備會議」，商議按憲法賦予的權利，成立一個組織，譚天榮提議起名「黑格爾——恩格斯學派」。第二天晚上，組織名稱改為「百花學社」。

語。1980年高校競選運動與1957年「五一九運動」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三點重要的區別：第一，競選運動雖然也受到嚴厲打壓，但是胡耀邦很快便清醒了，最終沒有在學生中抓「右派」；第二，在當時的高校學生中沒有出現尖銳的左右分野，絕大部分學生都是改革派；第三，競選運動的骨幹已經不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抱有幻想，他們的理想模式是民主政治加市場經濟^⑤。

六 超越修正主義

儘管「五一九運動」的主流意識形態是馬克思主義範疇內的修正主義思潮，但是也有一些例外，例如轟動一時的《自由主義者宣言》。張景中當時說：「這次運動的主流是好的，『自由主義者宣言』……可能是不好的，但這不是主流」^⑥。張元勳後來回憶：《自由主義者宣言》極為當局者所恨惡！「連後來為官方編集以作『反面教材』的《右派言論彙集》中也不使其存在！以免那太具說服力與煽動性的慷慨話語不僅不會被『批倒批臭』，或許還會『繼續毒害青年』，故乾脆除之務盡，不使為死灰，恐其復燃也！」^⑦與林希翎、譚天榮不同，《宣言》的作者嚴仲強表達了自己對於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懷疑：「不能簡單的由蘇聯生產資料公有制得出人民生活中所應當有的一系列的美麗的結論。斯大林時代實際上是奴隸社會和中世紀教會統治在否定之否定的意義上的復辟（人權的喪失，對思想異端的鎮壓……）。「蘇聯的很多錯誤都可以在中國找到它的縮影。」^⑧

相當一部分學生右派，雖然在1957年時思想尚局限於修正主義，後來則演變為自由民主主義者。林昭便是「五一九」精神昇華的一個傑出代表。

相當一部分學生右派，雖然在1957年時思想尚局限於修正主義，後來則演變為自由民主主義者。林昭便是「五一九」精神昇華的一個傑出代表。根據陳奎德的研究：「研讀林昭的作品，細考林昭的言行，其實，她的精神演變的脈絡是很清晰的：她本來是一位左傾理想主義青年，經歷五七之變，被毛氏卑劣陰謀所震撼，遂走上對中共體制懷疑之道。在煉獄的煎熬中，她苦思苦索，昇華出了卓然芳華的自由思想，皈依了以身殉道的基督精神，獲得了神聖性的精神救贖。」^⑨「五一九運動」前夕，林昭在1957年3月1日出版的《紅樓》第二期〈編後記〉裏寫道：「希望我們的歌聲像熾烈的火焰，燒毀一切舊社會的遺毒，以及一切不利於社會主義的東西。」^⑩此時，她仍然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五一九運動」期間，她既在辯論會上為受圍攻的張元勳說過話，也在十二名《紅樓》編輯批評張元勳「反黨」言論的公開信上簽過名。但她最終還是被判定為「參加了以張元勳為首的反動集團，以自由出版為名，搞起了反動刊物『廣場』，藉此向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的「右派份子」。幾年後，林昭又升格為「『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反革命集團主犯」^⑪。此時她坦承，自己曾是被「極權統治者」所煽惑利用的天真純潔的追隨者、盲從者之一，「1957年在青春熱血與未死之良知的激勵與驅使之下，成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份子！」「青少年時代思想左傾那畢竟是舊認識問題，既然從那臭名遠揚反右運動以來，我已日益看穿了那偽善畫皮下猙獰的羅剎鬼臉，則我斷然不能允許我墮落為甘為暴政奴才的地步。」對於曾經信仰過的「主義」，她已經沒有任何的留戀：「借用我們少年英雄中一位闖將的話來說：『假如那所謂的社會主義只意味着對於人的凌虐、迫害與污辱，

那麼，反社會主義或進攻社會主義就決不是一種恥辱！」在她起草的「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綱領中，提倡「私人設廠的經濟路線」。針對起訴書說她「妄圖收羅各地右派份子，在我國實施資本主義復活」，她批註：「正確地說是：計劃集合昔年中國大陸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份子，在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上掀起強有力的、劃時代的文藝復興——人性解放運動！」^⑥

註釋

- ① 陳奉孝：〈如此伎倆〉，載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頁218。
- ② 許良英：〈關於反右運動的片斷回憶和思考——紀念反右40周年〉（1997年5月10日），載《觀察》網站，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2810。
- ③⑤ 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424。
- ④⑥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33；333-34。
- ⑦ 錢理群：〈譚天榮：右派學生的另一個代表與象徵〉，載「學術中國」網站，www.xschina.org/show.php?id=2298。
- ⑧ 林希翎：〈我的思考〉，載《原上草》，頁163。
- ⑨ 1957年6月6日，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史良，秘書長胡愈之，辦公廳主任葉篤義，組織部副部長閔剛侯等邀請費孝通、錢偉長、曾昭掄、陶大鏞、吳景超、黃蔡眠六教授開會，討論首都各高等院校鳴放情況。被官方媒體稱為「六六六會議」或「六六六事件」，比喻為那個年代毒性最強的一種殺蟲劑。
- ⑩ 朱正：《1957年的夏天：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頁141-44。
- ⑪ 葉篤義：〈我的右派「罪狀」〉，《百年潮》，1999年第1期，頁21。
- ⑫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23。
- ⑬ 謝泳：〈林希翎與學生右派〉，《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年4月號，頁60、61。
- ⑭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發言〉，載《原上草》，頁153。
- ⑮ 譚天榮：〈我們為了甚麼——再致沈澤宜〉，載《原上草》，頁63。
- ⑯ 譚天榮：〈再談人性與階級性〉，載《原上草》，頁45-46。
- ⑰ 譚天榮：〈第二株毒草〉，載《原上草》，頁33。
- ⑱⑲ 譚天榮：〈救救心靈〉，載《原上草》，頁55-56；57。
- ⑲ 譚天榮：〈前言〉，《我的回憶與思考》，載「五柳村」網站，<http://56cun.anyp.cn/blog/archive/108797/060709170145140.aspx>。
- ⑳ 《丁抒作品選編第八章：數弊政舉國放言》，載「博訊」網站，www.boxun.com/hero/dings/11-1.shtml。
- ㉑㉒ 譚天榮：〈教條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載《原上草》，頁49；45。
- ㉓ 嚴仲強：〈壓制不了的呼聲〉，載《原上草》，頁79。
- ㉔㉕ 龍英華：〈「世界往何處去、中國往何處去、北大往何處去」〉，載《原上草》，頁132。
- ㉖ 佚名：〈北大民主運動紀事〉，載《原上草》，頁27。
- ㉗ 葉於注：〈我看民主〉，載《原上草》，頁140-42。
- ㉘ 王國鄉：〈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載《原上草》，頁149-50。
- ㉙ 譚天榮：〈幾句人情話〉，載《原上草》，頁52。

- ⑳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Praeger, 1957). 吉拉斯曾任南共聯盟中央書記、南斯拉夫副總統，《新階級》是他在1956年11月底被捕入獄前寫的。
- ㉑ 周大覺：〈論「階級」的發展〉，載《原上草》，頁167-70。
- ㉒ 群學：〈論「個人崇拜」產生的歷史必然性〉，載《原上草》，頁136。
- ㉓ 岑超南：〈特殊階層，安息吧！〉，載《原上草》，頁214。
- ㉔ 佚名：〈論現實社會中按勞分配原則的虛偽性〉，載《原上草》，頁243-44。
- ㉕ 佚名：〈現實的社會主義並非世外桃源〉，載《原上草》，頁241。
- ㉖ 劉建安寫道：「1998年，周大覺老師在中國民主黨湖南省黨部籌備組『公開申請書』中簽名，此後不久經人介紹認識了他老先生。他長我20歲。他的《二十五年煉獄》的稿件，我看過前一稿，現在是他的定稿。我感覺到，他真是『大覺』——先知先覺，豈不為大覺？他是右派乎？他是左派！他比1957年中共還要左！他主張巴黎公社的模式，並以此衡量，認為『蘇聯已經形成了新階級，中國正在形成新階級，南斯拉夫沒有形成新階級』，主張工人集體管理，反對中央集權，主張領導者拿工人的平均工資。他的『新階級論』可以說是一種『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參見〈讀陳述徵詩稿集《離亂餘音·農場記實》、周大覺《二十五年煉獄》有感〉，載網刊《民主論壇》（2006年2月4日），<http://asiademo.org/news.php?id=40&charcode=GB2312#12>。
- 陳奉孝回憶：「當時我天真地認為，南斯拉夫實行的『工人自治』可能是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http://members.lycos.co.uk/sixiang003/author/Other/C/ChenFengXiao_BeiDa.txt。
- ㉗ 郭羅基：〈一個人才，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哀沈元〉（2007年4月7日），<http://56cun.blogspot.com/2007/04/07/p23>。
- ㉘⑳㉙㉚㉛ 張元勳：《北大一九五七》（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頁28；59；73-74、79；139-41；69。
- ㉜ 沈澤宜、張元勳：〈是時候了〉，載《原上草》，頁16-18。
- ㉝ 魯丹：《70個日日夜夜：大學生眼睛裏的1957年之春》（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6），頁48、128。
- ㉞㉟ 王書瑤：《未名湖畔花盛開》，第一章，曾刊於「奇虎網」。
- ㊱ 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
- ㊲ 丁抒：《陽謀：反右派運動始末》（香港：開放雜誌社，2006），頁154。
- ㊳ 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張元勳：《北大一九五七》，頁98。
- ㊴ 王書瑤：《未名湖畔花盛開》，第三章。
- ㊵ 張煒：〈胡耀邦心靈的掙扎〉（2005年11月17日），載「博訊新聞網」，<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5/11/200511171455.shtml>。
- ㊶ 喻希來：〈北京高校競選運動〉，載「博客中國」網站，<http://cjch.bokee.com/5846764.html>。
- ㊷ 張景中：〈與段、江、程、丁四位先生談話的內容摘要〉，載《原上草》，頁73。
- ㊸ 轉引自丁抒：《陽謀》，頁155。
- ㊹ 陳奎德：〈林昭：中國的聖女——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載《觀察》網站，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3819。
- ㊺ 轉引自張元勳：《北大一九五七》，頁22。
- ㊻ 傅國湧：〈光榮與屈辱——讀林昭批註的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2006年6月11日），載「博訊新聞網」，<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6/06/200606140612.shtml>。
- ㊼ 傅國湧：〈新發現的林昭文稿〉，載《開放雜誌》網站，www.open.com.hk/2006_7p08.htm；〈林昭遺作——獄中血書節選〉，www.recordhistory.org/mediawiki/index.php。